

清明忆母

清明节到了,我又想起了母亲,想起了与她共度的那些岁月。那些深深浅浅的日子,像一条河在心底安静地流淌。

记忆里,永远有一幅画:清晨的阳光温柔地洒在山路上,路边的野花开得烂漫,母亲挎着那只干净的单肩帆布包,匆匆走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。时间于她,仿佛永远不够用——学校里的学生,田里的庄稼,都是她放不下的牵挂。记忆中的母亲,永远在赶路,永远忙碌着。

母亲留下的照片不多,我却至今珍藏着一张。照片上的她梳着两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,剪着齐齐的刘海,瓜子脸,嘴角含着浅浅的笑意,文静而秀气。那是1974年,母亲在三汇高中毕业时的留影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,我总觉得时间就停在了那一刻,停在她最美好的年华。

高中毕业,母亲当了民办教师,也是我的启蒙老师。五岁那年,我跟着她去了学校,她教我们语文、数学,也教音、体、美。虽然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,母亲对我却格外严格。她常说,不能因为是教师的孩子就搞特殊,学习上、品德上更要起带头作用。

父亲是放映员,长年在贵福片区放电影。家里的农活,全落在母亲的肩上。从我记事起,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做早饭。等我和弟弟吃完饭,催着我先去学校,她还要洗碗、洗衣、打猪草。去学校的路上,她总是小跑着,那只干净的书包里,除了教科书、各课本,还有一把粉红色的梳子——她常常一边赶路一边梳头。农忙时节,她更是忙得脚不沾地。

我们家住在铜鼓寺的寺庙里。院子分上、中、下三殿,院坝铺着青石板。包产到户后,每家分了一块晒场,寺庙里住着将近一百口人。傍晚是院坝最热闹的时候,连叫声此起彼伏,母亲总是最后一个收工。有一回,她忙完别的生活计回到院坝,别人都散了。月光下,她一个人挥着连枷,蹲下身子翻抖藤蔓,用耙子把外壳扒到一边。怕看不清,她点上一盏马灯,橘黄色的灯光映着她瘦削的脸和单薄的身影。我坐在台阶上陪着她,盼着她快点忙完,不知不觉打起瞌睡,弟弟早已在家里睡着了。直到夜深,母亲才收拾停当。回家煮了面条,只放点盐和醋,弟弟被她抱在怀里,闭着眼睛吃,母亲疲惫又心疼的样子,直到现在我仍记得清清楚楚。

因为忙,母亲总是稀饭就泡菜。家里有七八个泡菜坛子,装着大蒜、泡萝卜、长尾葱、团葱、洋姜、酸菜梗,洋姜最多。那时候山里人家都穷,几块钱的学费也缴不上。洋姜收获的季节,有家长对母亲说:“芙蓉老师,我拿点洋姜抵学费行不?”善良的母亲总是答应,她也因此赢得了家长们的敬重。

母亲很爱美、爱生活。她有好多漂亮的衣服,只是在上课、开会、外出时才穿,一回到家就换上劳保服。母亲喜欢给我们姐弟俩照相。邻村有个照相师傅,农闲时走村串户,每次他来,母亲就把我和弟弟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。我们或站在坝子里、竹林下,手拉着手,或各捧一束塑料花,母亲就站在对面,笑盈盈地望着我们,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。那些照片被她镶在玻璃相框里,挂在堂屋墙上,成了我家最亮眼的装饰。

1984年下半年,母亲嫌老房子太窄,和父亲商量后,花五百块钱买下集体空置的房子。母亲费了不少心思把房子弄得牢固又漂亮,远远地隔河都能望见。家门口是一条大路,邻村赶集都从这儿过。母亲说,在楼下开一家小卖部吧,方便乡邻,也能贴补家用。寒假里,她和父亲搭起货架,摆上针头线脑、烟

酒糖、火柴肥皂、洗衣粉,过年还添了草纸、鞭炮和五颜六色的气球。

开小卖部,母亲更辛苦了,进货要去十几里外的贵福镇,全靠肩挑背驮。我曾和她去过一次,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,一个多小时后到了镇上。母亲拿出头天晚上理好的货单,一家家询价、选货、付账、装货。为了早些回去,她在街边给我买了两把麻花和一个锅盔,就匆匆往回赶。我跟在她身后,走累了就耍赖不肯走,母亲对我说:“你慢慢走,我在前面歇着等你。你现在好好读书,将来才能走出这座大山。”

1985年,春季开学,母亲去柏水乡中心校开会,回来时背着几十本教科书,路过一个村子时被狗咬了。她后来说:“听见狗叫,我吆喝了两声,手里没有东西挡,又要护着书,躲不开。那恶狗从后面咬住我的小腿,撕了个大口子,血把裤脚都染红了。”

1986年春天,刚开学不久,母亲开始头疼,吃了头痛粉也不管用。县医院确诊是脑部恶性肿瘤,因为治疗费用太高,她放弃了去大医院做开颅手术,转到了鲜渡区医院保守治疗——吃中药,用西药止痛。母亲在医院里,想念我和弟弟,我们先后被带到医院去见了她一面。她叮嘱我们在家要听外婆的话,说她很快就能回去。我和弟弟像小大人一样,在外婆和奶奶的操持下,放学后割猪草、煮猪食、喂猪,下半年还卖了一头肥猪。当外公把我们喂猪积攒的钱带去医院给母亲治病时,她大哭了一场。

冬月里,离开家近一年的母亲终于回来了,我和弟弟别提有多高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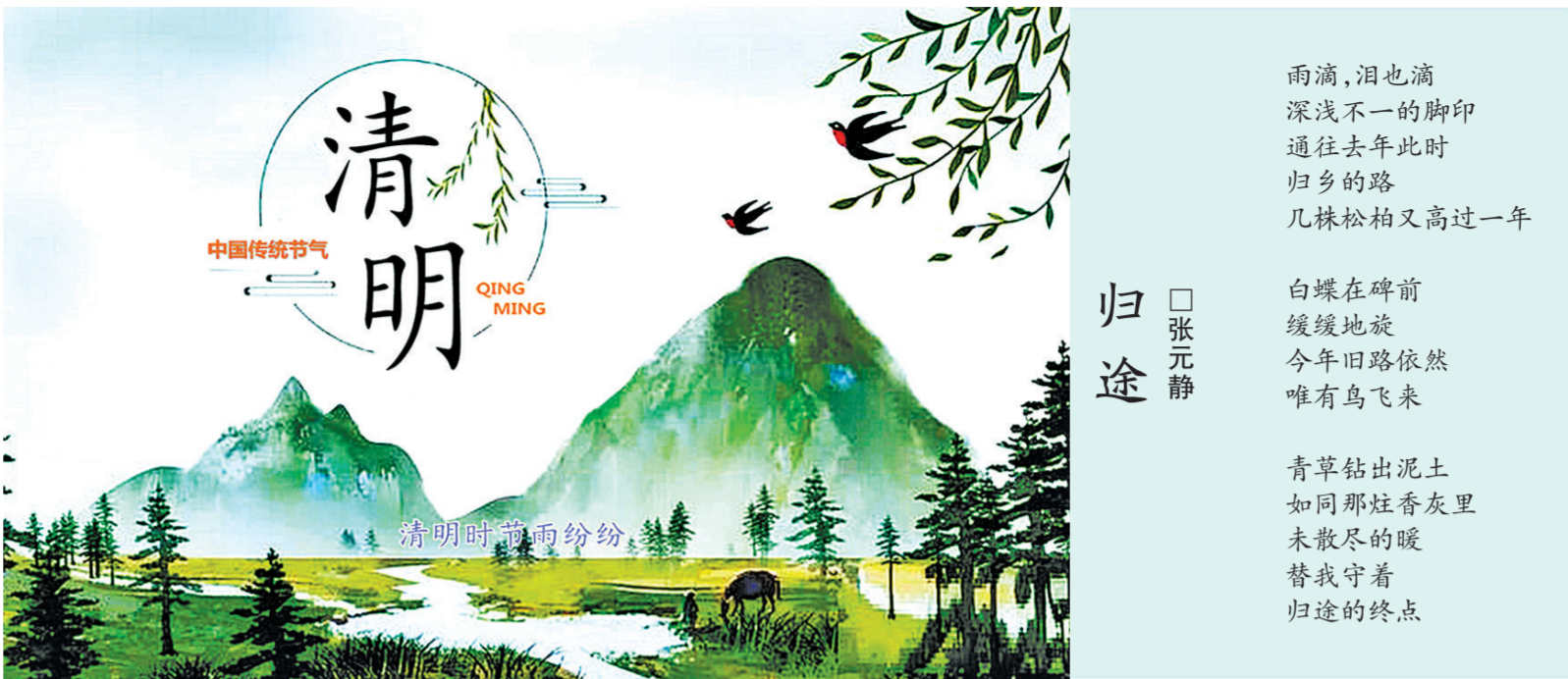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脸色蜡黄,裹着厚厚的军大衣,身体愈发瘦削,空荡荡地撑在衣服里,脖子上围着围巾,走路都要人扶。肿瘤压迫着神经,她的视力模糊了,声音变得尖细,记忆和反应也大不如前。她最开心的时刻,是我们放学后去看她,陪她说说话。母亲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,有一天,我刚进堂屋,就见母亲头痛又犯了。她头上冒着汗,紧咬牙关,痛苦地呻吟:“老刘,我的头像有人拿铁棒在敲啊……”那时候我还不不懂,母亲每天都在和病魔搏斗,和死神赛跑。我还盼着过年,盼着她的病好起来,盼着穿新衣服。

1987年,腊月二十三早上,父亲去村里开团年会。外婆一大早就来了,母亲精神出奇地好,她对外婆说想吃汤圆。快到中午时,我们在院子里玩耍,突然被外婆叫回家。母亲看着我们,气若游丝,嘴唇翕动着,却再也说不出话。我跪在母亲床前,不敢碰她,怕弄疼她,只是哭喊着:“妈妈!妈妈!我是你的小利,你看看我,你不要走,我再也不要新衣服了……”母亲的目光停在我的脸上,手微微动了动,想抬起来摸摸我的脸,却没有了力气。她的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声响,嘴角抽动了一下。她看着我,又望向门口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……她终究没能等到父亲和弟弟回来,在我的哭喊声中,她离开了生活了三十三年的人间。

……

如今,母亲离开我已经三十九年。回忆很疼,母亲离世时,脸上的泪痕像是一道疤烙在我心里。我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后,更明白了母亲的心痛和不舍。一天夜里,我做了一个梦:梦见我正在老家的菜园里摘菜,抬起头时,看到母亲衣衫褴褛、面容憔悴地站在田坎上望着我,我心如刀绞,泪如泉涌,心疼地问:“妈妈您怎么了?为什么会穿成这样?”醒来才知道是梦。那年春节,我给她烧了好些纸钱和纸衣,我要让爱美的母亲永远漂亮地活在我心中。

凤凰山·清明特别策划



清明时节,祖坟背山的树叶从早春的嫩绿悄然变成油亮的翠绿,坟头的杂草借着春雨疯长,郁郁葱葱,静谧而深沉。

依照老家习俗,春节、清明节都要祭拜逝去的亲人。母亲在世时,是她带着我去;母亲去世后,是我带着女儿去完成这世代相传庄严而神圣的礼仪。祖父一生,虽不像高祖那样攒下万贯家产,但乐善好施,豁达仁义,为家族和后人赢得了良好口碑。

高祖

趁着雨停的间隙,来到祖坟林。首先给辈分最高的高祖上坟,所有的礼数一样没落地完成,为遵守用火安全,我守着纸钱燃尽。

缕缕青烟,袅袅升腾。我学着当年母亲的样子,照着记忆中母亲念叨过的一些话语,像是自言自语,也像是讲给自己或女儿听,或是当着先人的面,讲讲他们的生平事迹。

清朝末年,高祖跟着逃难的人流落到碛子庙杜家坝。先是给地主家抬石头、垒土墙、推石磨,干最累的活,吃最差的饭。

地主见高祖勤劳能干,有点文化还写得一手好字,便把他留下来当长工。后来,高祖承包了地主家的田地耕种,成了佃户。同时不断开荒拓土,精耕细作,最终靠勤劳和智慧逆天改命,晚年,他已拥有不少家产。

据说,高祖花了三年时间,请人给自己修了一座陵寝,却最终无福消受。高祖去世后,打开密封的墓穴石门,出现不可思议的一幕:墓穴里有一窝老鼠。按照风俗,墓穴有老鼠窝是不能葬人的。作为高祖唯一的儿子,祖父深知为修这座陵墓几乎耗尽了家里的钱粮,已无力再修同样气派的陵墓。就在自家菜地旁选了一块阴地,用长短不一的条石砌成三角形,就成了如今看到的高祖之墓。

这块地,从此成为至亲离世后的归处——我家的祖坟林。

祖父

祖父是一位郎中。一生悬壶济世,扶危济困。

雨滴,泪也滴
深浅不一的脚步
通往去年此时
归乡的路
几株松柏又高过一年

归途

□张元静

白蝶在碑前
缓缓地旋
今年旧路依然
唯有鸟飞来

青草钻出泥土
如同那炷香灰里
未散尽的暖
替我守着
归途的终点

懂人情世故。”

一生未能孕育男丁的外婆,自觉亏欠老朱家的。只能一边偷偷抹眼泪,一边烧火煮饭。

我出生后,外公欢喜得不得了,天天背着或抱着我去河边放牛钓鱼。牙牙学语,他就教我背三字经;蹒跚学步,他就教我数数。

母亲

母亲的墓碑石还很新,坟头的草刚开始长出。

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,属于超生子女。按当时的规定,要被罚款一百多元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一百多元钱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。没钱交罚款,就用工分抵扣。母亲除参加生产队全天劳动外,还负责喂养生产队的两头大水牛。

听母亲讲,我出生后的头半年,家里特别艰难。在生产队分不到粮食,每天收工后,父母只得在家里仅有的几分自留地里卖力气、要口粮。

庆幸的是,得到了母亲从小就非常亲近的隔房么外婆的帮衬,外公、外婆和几个姨娘也没少助力。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时候,他们节衣缩食,从牙缝里省下食物,接济揭不开锅的父母。

土地包产到户后,勤劳的父母无论天晴下雨、打霜落雪,每天都在土里刨食,鸡鸭鹅牛羊猪比谁家都喂养得多。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母亲,在我的印象中是单薄、瘦弱,待人和善,骨子里却透着好强,不服输,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力气,就像一个陀螺,一直在不停地转。即使我们三姊妹都成家立业了,她还是闲不住:种菜、买菜、捡野菌、挖折耳根、掏石陵姜,只要能变成钱,什么活儿都干。

终于,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

母亲生前曾一遍遍给我讲述那些过往历史,今天我又一遍遍讲给女儿听。我想母亲讲这些是为了让我知道来时路,想让我记住自己的根脉在哪里,直接抱怨,脾气暴躁的外爷就会吹胡子瞪眼睛警告。如果外婆还不“收敛”,外爷就会朝着外婆挥舞拐棍,呵斥她:“不

未及之诺

清明节前几天,是祖父的头七,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父亲跪在坟前一边化纸,一边念念有词。坟前的泥土柔软而新鲜,坟脊上的花圈还带着新色,坟旁白色的萝卜花上,沾着未燃尽的纸屑,被细雨淋透的土壤里,冒出几株新芽——那是祖父入土时,按老规矩撒下的五谷,听说是祖父临死前最后的交代,也是对子孙后代最后的祝福。

祖父去世的那天,我在城里准备学校开学工作。母亲打了好几次电话,我都没能接到。直到中午,我才从丈夫嘴里得知祖父离世的噩耗。我丢下工作,连夜赶回去,一进门,堂屋里那口红色棺木如芒针般刺红了我的眼。母亲说,过完年祖父吃东西越发艰难,一天只能靠半瓶牛奶维持,人也是半糊涂半清醒。清醒时,常念叨我什么时候回去。如今我回来了,他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到院子里迎接我。望着黑白色的遗像,自责与悔恨把胸口堵得发慌。我不忍直视,转身的瞬间,眼泪早已泛滥。

去年清明,我去养老院看望祖父。我坐在他的床头,听他反复念叨着祖母的名字,说梦见祖母本来在灶前忙碌,见他卷着烟叶,就跑来抢过去塞进灶膛。祖母走后的三十多年,祖父总喜欢做梦,不是梦见祖母抢他的烟叶,就是梦见祖母抢他的酒杯。小时候,我常常以为做梦是因为梦里踢了被子,所以才让梦有了可乘之机,便学着母亲叮嘱我的样子,叮嘱祖父睡觉要盖好棉被。祖父听后,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,眉尾处几根参差不齐的眉梢都快嵌入眼角的皱纹里,像画报里的寿星,看着看着,我也跟着祖父哈哈大笑。那段与祖父待在一起的时光,成了我长大后最美好的回忆。

后来,因为工作,陪伴祖父的日子越来越少,偶尔去养老院看望他,也只是陪着他坐坐、聊聊天。祖父是高兴的,每次他都会拉着我的手,询问我的工作、生活。

可那一次探望,他却一反常态,开始念叨想回家,想去祖母的坟前看看,想在老家的院子里走走。我是家族里最小的孙女,对于祖父的去留没有任何发言权。我拉着他的手,告诉他,等放长假就回来看他,给他买零食,买水果。祖父一言不发,低垂着头,旁边的老人都劝他留在养老院,这样有人照顾他,不给儿女添麻烦。祖父年岁大了,那些话他听见没有,我不得而知。

或许他听见了,只是不想作答罢了;或许他并未听见,所以无从谈起。过了片刻,祖父用弯曲的手指在腿上摩挲着,无处安放的手如同离树的枯叶,迷茫、无助。我握住他如山石般粗砺的手指,厚重的老茧割得我心口发酸。

我们就这样静默着,坐在院子里。阳光从屋檐下翻身去了院角,我不得不起身跟祖父告辞。他一听我要走,抱怨道:“才来一会儿,就要走了。”我扶着他在院子里走了一圈,承诺“五一”假期一定来看他。祖父叹了口气,小声嘟囔道:“太远了,你来回跑,麻烦……你空了再回来吧!”来不及回应,我把他安顿在椅子上,便抽身离开了。

“五一”假期,因工作和孩子,我没能回去,之后一直拖到春节,再也没去看过祖父。如今我回来了,想陪他在家乡小路上转转,想再听他讲讲那些有趣的往事,还想依偎在他肩头看他编织斗笠……可一切都不可能了。

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明明才几个月没见,明明说好的给他买吃的,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,怎么能让我半途而废呢?他安静地躺在那里,怎么就不能再回应我一次?是责备我食言,还是怪我姗姗来迟?

无尽的痛苦将我紧紧裹住。恍惚间,一只蜜蜂从我的身旁飞过,在棺木前飞舞、盘旋,最后停在我的袖口。父亲喃喃道:那一定是祖母来接祖父团聚了。我却固执地认为,那是祖父在与我作最后的告别,“嗡嗡”的鸣叫应是他未尽的话语,纤细的触角是他最后的抚摸。

清晨,祖父在鞭炮声中入土为安,连同我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岁月,一并归于尘土。从此,故乡于我,又多了一座坟。